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日本 近代知识分子

的

刘家鑫 著

中國觀

南開大學出版社

RIBEN JINDAIZHISHIFENZI DE ZHONGGUOGUAN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

刘家鑫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
轨迹 / 刘家鑫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310-02752-1

I. 日… II. 刘… III. 汉学—研究—日本—近代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07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 插页 234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教外司留（2005）55号]

Th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State Education Ministry.
(The Project-sponsored by SRF for ROCS, SEM.)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已故古厐忠夫教授

序言一

日本德川幕府末年，在有识之士之间酝酿变法图强。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由一个近世封建主义弱国，一跃成为近代封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跨越式发展后，日本达到了近代化的目标。然而，其后的日本，开始实施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目的是侵略亚洲，独霸中国。尤其是抗日战争前与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野心勃勃，右翼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疯狂至极。这些战争狂人不但肆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还与英美等西方列强国家相对抗，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侵略者最终在1945年战败投降，成为国际社会的阶下囚。

战争年代，日本标榜“八纮一字”，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由于战败投降，那些自欺欺人的政治理想和口号，也随之烟消云散。同时，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兴亚论”思想和“中日合作联盟论”等观点，也被战后的历史进程所尘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开启尘封，拨云见日，重温历史，回顾过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些工作，将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之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战前的日本之所以一步步地走向侵略扩张主义的深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与明治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关，

也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认识紧密相联。明治中期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日本的知识界，逐渐形成了“脱亚论”与“兴亚论”这两种思想暗流。在现实政治发展变化的激流中，日本知识分子们的兴亚思想也分裂为两种类型：一是善意的，即中日两国平等联合；二是具有野心的，即日本侵略势力妄图独霸中国。发掘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分析研究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客观看待历史人物，深刻揭示其思想内涵，鉴别其善善恶丑，是当今历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本书的作者刘家鑫老师，在研究日本近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中国通”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在本书《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首先以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为引子，指出了目前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缺憾。他认为，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有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发表了自己的中国观，谈论了中日关系问题。这些人留下了大量的论著，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考察。而目前学术界不太重视这方面的课题，很少有人主动研究日本中国通人物的思想言行。其实，这是一项很有前景的开拓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又在瞬息万变的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在学术研究上，中国通还没有被单独立项进行考察，而是被包括在“日本浪人”之中。刘老师试图将文人派中国通，从日本浪人的领域里分离出来，当做一个独立门类进行分析研究。进而，他试图深入探讨几项问题。例如，中日关系瞬息万变，中国通们将沿着怎样的思想路线发展变化？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作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以两个著名的中国通——后

藤朝太郎和长野朗为例，展开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研究。另外，以往的研究主要以“善恶两分法”为模式，将研究对象公式化地、硬性性地规定为好人和坏人。在这里，作者将超越那种固定模式，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依据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历史事实，分析论证中国通的言行，力求揭示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作者总结了中国通的几种思想性格。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普遍蔑视中国的民众，否定中国的现实，但中国通们却或赞赏中国人的顽强精神，或高度评价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其二，中国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其言行也随波逐流，起到了体制扶翼的作用，但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又产生了非战的思想意识，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其三，中国通反对“脱亚论”思想，它们沿着“兴亚论”或“大亚洲主义”的思想潮流发展变化，但其“中日合作联盟论”等观点，却受到了善意的平等联合和野心的侵略独占这两种思想意识的影响。本书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中国通，其政治观点和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对研究现在的日本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意义。

刘家鑫老师，是我二十余年前教导过的学生。他在大学时期，并非是个聪明能干的学生，也没有取得过显著的成绩。但他学习非常努力，刻苦钻研学问。他克服身体的疾病和家庭的许多困难，一心向学，追求真理，勇于进取，顽强拼搏。正是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他去日本留学深造，并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他著书立说，自立一家之言，还课徒授业，传承学问精神和学术方法。现在，不光是刘老师本人在学问之路上有所建树，就连他

教导出来的首位硕士毕业生，也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我为刘老师的斐然成绩而高兴，更是钦佩他的积极向上精神。我希望他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级人才。

盛情难却，特作此序。

李树本 识（年八十有二）

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序言二

首先必须申明的是，我没有为刘家鑫先生的大著《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写“序言”的资格。本来，应该由他的导师古厩忠夫老师来写，但遗憾的是古厩老师已入鬼籍数年。我从黄泉之国，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柴田君，你要给刘先生的书写个序言。”我拒绝说：“这是哪里话！本人无法替代古厩老师。”然而，总得有个人来充当这一角色。这就好比是棒球比赛，在关键的时刻，教练要找出一个替补队员来，找到了谁，那是怎么也推卸不了的。做为刘先生的朋友之一，我还是应承下了这件事。

刘先生于1988年秋天，负笈东渡、留学日本。我记得，他起初是在仙台的官城教育大学和东北大学。之后，他来到新潟大学的研究生院，拜古厩忠夫为师。他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良师，度过了一帆风顺的博士研究生阶段。但我知道，他在生活方面吃了不少的苦。他还多次犯规，比如把寝具带到教研室里并住下，等等。然而，也许那时候的辛苦才铸成了现在的刘先生。

此次大著付梓出版，最高兴的应该是其亡师古厩忠夫吧！因为在日本有这样的说法：淘气的小徒弟是最可爱的。

且说《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一书，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的考察，这两个人物的共同点是“中国通”。不言而喻，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辅车相依的关系。但是，自明治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清朝）的衰弱，在日本朝野刮

起了一股蔑视中国的风潮。“谢绝坏朋友”是通往近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言论在启蒙思想的名义下被夸大其词地宣传蛊惑。其中，中国通或者日本浪人们，有许多人挺身而出，以“捍卫中国”而自居。

在这种情况下，后藤与长野依然主张，日本人必须要深刻地理解中国。可以看出，刘先生通过描写这两个人，尖锐地批判了日本人蔑视中国的风气。中国与日本，双方之间有着数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如果想一想内藤湖南所说的话，那么就会明白：在底部深层滚动的东西，必定朝着一个大的方向缓慢、沉重、顽强地滚动着。这样一来，看待中国的社会，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其表面现象上，而是需要从根本上理解中国才行。

后藤与长野正是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人物。只是，他们有时被时局所捉弄而不由自主。除此之外，还应该思考他们与亚洲主义思想之关联。

目前的日中两国间，悬案问题堆积如山。但我认为，现在依然是不能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必须要在真正的意义上，深刻地理解日中关系。

新潟大学国际中心

柴田幹夫

序言三

提起日本的中国通，人们自然会想起土肥原贤二、川岛浪速（著名女谍川岛芳子即金碧辉的义父）等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期间著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鸠山，也是一个中国通。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时，又是中国通利用仁丹广告为日军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进军路线图。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中国通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帮凶、走狗、马前卒。

然而，在日本近现代的历史上，真正的中国通却是一些精通汉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这其中有好、有坏、有中间派。如此说来，研究中国通就不能感情用事。那么，历史上的中国通是个什么样子呢？本书作者刘家鑫老师在《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一书中，将给出一个答案，还其本来面目。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一部研究日本中国通的专著，即便是在日本也没有此类的专著问世，所能看到的只有三石善吉的《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萩野脩二的《与鲁迅不和的中国通、泽村幸夫》和《某中国通的轨迹、泽村幸夫》，还有桂川光正的《后藤朝太郎、中国、鸦片》等几篇论文。由此可见，有关日本中国通的研究在当今中日两国的学术界还是“一片大沙漠”。

刘家鑫老师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一书的问世，填补了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关于日本中国通研究这个领域里的空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在本书中，首先考证了中国通的

历史源流，然后超越了“善恶两分法”的模式，以史为据，辩证地、客观地分析论证了当年两个著名的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在抗战爆发前后的言行，真实地揭示了他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将是大有裨益的，以后的历史将会为此作证、作注。

刘老师早年留学日本，十年寒窗学有所成，在学术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写作本书时三易其稿始付梓，其刻苦认真之精神，令人钦佩。他治学严谨，教导有方，解惑授业，诲人不倦。前些时候，刘老师培养的首位硕士毕业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可谓著书育人硕果颇丰。愿刘老师著作等身，县内县外，遍结桃李。值此机会，赋诗一首，以示对刘家鑫老师的敬意：

弱冠习射赴东洋，
管城荷肩始自翔。
乌飞兔走何其速，
人间世事有苍茫。

张新华 题

2007年5月10日

前 言

1998年10月中旬，笔者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给日本国立新潟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系，1999年1月中旬参加答辩，同年2月中旬论文获得通过。该论文的正题是“关于中国通的中国认识的研究”，副题为“以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为中心”，全文由六章构成。现将原学位论文译成中文，又在译文的基础上，做重大修改增删，重新谋篇组合。现全书共分十章，定名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付梓出版，求教于大方。

首先说明一下本书的基本内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怎样看待中国和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问题，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温存稳健派，又有积极侵略扩张派，还有占大多数的中间犹豫派。日本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结束。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是两位中间层的“中国通”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1906年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笔者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探讨日本近代中国通的思想。通过他们的言行，分析研究其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的思想内涵，梳理归纳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适当地评价其精华部分，更严肃地批判其糟粕的成分。笔者力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批驳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的谬论。

探究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日本中国通的对华观，揭示其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和相互矛盾性，对剖析现在日本人的中国观

及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细部分析的研究成果为证据，来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侵略有理论，批判反动文人的自由主义史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辱宰割的国耻不能遗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随意篡改。在 21 世纪的今天，以史为鉴，知己知彼，励精图治，锐意自强，方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笔者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说起，指出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前后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力度，强调了研究中国通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深入细致地解释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可以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本普通大众对华认识的脉搏。

日本明治十年（1877 年）以后，出现了“脱亚论”和“兴亚论”的思想潮流。这两股思潮，对日本国内形势乃至国际政治走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还在思想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其中，中国通是沿着哪一条思想路线发展变化的，其心理是崇敬中国还是蔑视中国，其言论是体制扶翼还是反战非战，其思想意识是主张善意的中日平等联合、还是图谋独霸中国并占领亚洲，如此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依据第一手资料，分析论证了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等人物的思想言行。在以往“善恶两分法”的基础上，着眼于中间层知识分子，既抓住其左右摇摆不定的性格特征，又客观地阐明其思想实质。

关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中国通的研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不多。迄今为止，只有立命馆大学萩野脩二教授写过两篇研究中

国通泽村幸夫的论文。关于后藤朝太郎，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先生曾撰文说：“后藤是典型的中国通，他的中国观是战争时期日本人对华观的平均值，希望有人系统地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内涵。”1974年8月，筑波大学三石善吉教授发表过《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一文，介绍分析了后藤其人。1999年3月，大阪产业大学桂川光正教授发表过论文《后藤朝太郎、中国、鸦片》。

有关长野朗的研究，更是少见。据长野朗后人讲，以前曾经有人来到他们家里，借阅过其父亲的著作。其资料收集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战后时期，重点关注的是长野朗参加农民运动与他的自治论思想。但经调查检索，一直未见有人发表相关的论文。而且，在学术界也从未有人提到过抗战前后的长野朗，忽视了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及其思想成果。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试图作一点开拓创新性的工作。

在本书中，笔者力图抓住以下几个重点：第一，考察抗战前后的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看一看这两人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二，探明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第三，探讨他们是怎样思考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悬案问题的；第四，区分两者性质的异同，找出其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搞清日本的中国通在中国认识与中日关系问题上呈现出怎样的思想要素，又具有哪些实际作用和历史意义。本研究课题有以下两个难点：其一是，如何将文人型中国通从日本浪人的范畴中区分出来；其二是，阐明在近代日本的思想史上，中国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近代日本中间层知识分子的研究价值。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这两个中国通为后世

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他们的存在正在逐渐被学界同仁所接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本书只不过是这两人的思想状况、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所进行的初步分析和解释。笔者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向学界推出自己微不足道的成果。笔者翘首以待，希望学界同仁广泛探讨日本的中国通，解析普通大众化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新颖的研究成果。最后，就本书的思想观点、学术方法、文章结构和语言运用等，仰望识者不吝赐教、精心斧正。

著者 谨致

2007年7月